

翁方綱的杜詩閱讀與研究

——基於文獻、閱讀史與“過程”的考察

孔燕君

提 要

翁方綱(1733—1818)於杜詩學用力頗深,這一點於清代杜詩學史而言殆無異議。但須注意的一點是:學界有關翁方綱杜詩學的研究,不應局限於詩學理論層面的勾勒與連綴,更應落具體實於翁方綱本人研讀杜詩的行為及過程中,而“文獻”與“閱讀史”正為這一研究提供了兩種切實可行的方法及思路。以文獻和閱讀史的角度切入,追溯和還原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經歷和場景,將翁方綱的閱讀經歷具體落實於書籍、文本以及相應的物質渠道和現實來源,有助於更完整和具象地推衍翁方綱杜詩學知識架構的形成過程;甚至,透由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文獻考索與過程還原,清代中期官僚型及學者型文人研讀杜詩的一般閱讀史圖景及其局限亦可從中得以蠡測與管窺。

關鍵詞: 翁方綱 杜詩文獻 清代詩學史 閱讀史 過程

翁方綱(1733—1818)的杜詩學,作為清代詩學史上的一個重要話題,歷來備受關注。乾隆五十八年(1793),陸廷樞在為《復初齋詩集》作序中即斷言翁方綱詩“服膺在少陵”;¹作為及門弟子的梁章鉅亦多感慨“吾師於杜詩工力最

1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首,《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381,頁1。

深”，²可見翁方綱頗用力於杜詩這一點，在其生前就已得到故舊知己與弟子門生的確認。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翁方綱的杜詩學，作為清代杜詩學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在現代學術研究當中，也已獲得不少關注與討論。尤其是以《杜詩附記》這一批點本為考察中心的研究成果，學者們對其中所包蘊的翁方綱的杜詩學觀念、其杜詩學理論與肌理說之間的關係等話題，都已作了相當程度的開拓研究。³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從學理層面剖析翁方綱的杜詩學思想，進而對翁方綱詩學與杜詩之間進行理論與邏輯層面的勾勒與連綴，對於翁方綱杜詩學研究來說，確為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之一。但這種研究思路也存在顯而易見的局限，即所謂思想、觀念的連結與綴合事實上僅限於抽象的理論層面展開，而未能具體落實在物質或現實層面上，這就使得相關討論不免呈現出一些“空中樓閣”的意味，未能落到實處。因此，有關翁方綱杜詩學的研究，或許仍存在其他重要視角亟待發掘與應用，而“文獻”與“閱讀史”正為這一研究設想提供了兩種切實可行的方法及思路。

承上言之，關於翁方綱杜詩學的研究，除了目前已有的理論層面的考察之

2 梁章鉅：《浪跡叢談》（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卷10，頁10a。

3 有關翁方綱杜詩學的研究成果，專題論文可參見詹杭倫：《翁方綱之“杜詩學”綜論》，《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3期，頁38—48；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微》，《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7月），頁179—204；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漢學研究》第28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35—165；莫崇毅：《翁方綱〈杜詩附記〉初探》，《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頁90—96；張東艷：《清代杜詩批評的新變——以翁方綱為中心》，《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12期，頁116—123；劉亞文：《由蘇入杜：論翁方綱學人之詩理論體系的建構》，《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頁179—191；張東艷：《翁方綱論杜詩》，《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頁75—81。除專題論文外，部分研究專著亦涉及有關翁方綱杜詩學的討論，參見孫微：《杜詩學通史·清代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442—447；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566—586；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121—132；葉倬璋：《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48—176；吳中勝：《翁方綱與乾嘉形式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33—146；唐芸芸：《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43—65、160—173。就文獻整理而言，賴貴三以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翁批杜詩》稿本為底本，點校出版《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一書，為翁方綱杜詩學研究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文獻基礎。參見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外,我們仍可以從文獻稽考與閱讀過程還原的角度加以觀照。翁方綱具體如何研讀杜詩?他閱讀過哪些杜詩相關的研究書目?具體通過哪些現實渠道研讀杜詩?又如何建構起杜詩學的知識架構?從文獻和閱讀史的角度切入,對翁方綱研讀杜詩的過程作一次全面細緻的爬梳整理,以此追溯和還原翁方綱閱讀杜詩的經歷和場景,盡可能落實翁方綱研讀杜詩具體所採用的文本以及書籍渠道,進而推演和還原翁方綱杜詩學的知識建構過程,或許是另一種行之有效且確然有據的研究路徑。此外,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對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文獻考索與過程還原,事實上也為學界進一步探究清代文人研讀杜詩的一般閱讀史圖景及其局限打開了一個新的切口。換言之,藉助翁方綱杜詩閱讀與研究的個案稽考,清代中期官僚型及學者型文人的杜詩接受問題亦可得到更局部、細節且落到實地的討論。

一、線性考索：翁方綱研讀杜詩的若干階段與特點

翁方綱曾於《杜詩附記》自序中回顧自身研讀杜詩的若干經歷,言:

余幼而從事焉,始涉魯豈、黃鶴以來諸家所謂注釋者,味之無所得也;繼而讀所謂千家注、九家注,益不省其所以然。于是,求近時諸前輩手評本,又自以小字鈔入;諸家注語,又自為詮釋,蓋三十餘遍矣。乾隆丁丑、戊寅,館于蠡縣,擱筆不為詩者三年,始于諸家評語慎擇之,惟新城王漁洋之語,最發深秘,乃遍摭其三十三種書,手鈔一編,題曰《杜詩話》,自以為有得矣。然而漁洋之言詩,得詩味矣,深繹而熟思之,此特漁洋之詩耳,非盡可以概杜詩也。一日讀山谷《大雅堂記》,而有會焉,曰:“諸先生之論說,皆臆語耳。”于是手寫杜詩全本而咀詠之,束諸家評注不觀,乃漸有所得。如此又歲餘,而後徐徐附以手記,此所手記者,又塗乙刪改,由散碎紙條,積漸寫于一處。甲申、乙酉以後,按試粵江,舟中稍暇,錄成一帙,後乃見吳下有專刻杜詩全文,無注釋之本,便于攜閱。庚戌以

後，內閣廳事每于待票籤未下時，當午無事，則以此本覆核，如此者又十年。⁴

莫崇毅曾根據此段自述，將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經過簡括為“少年時遍覽諸家評注以熟悉杜詩”、“蠡縣就館期間(1756—1758)以漁洋評杜為準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京任職以後逐漸形成自己的杜詩學觀念，並以《杜詩附記》的成書標誌其肌理詩說在杜詩批評上的成熟”⁵三個階段。應該說，這一概括已經較為扼要地清理出了翁方綱研讀杜詩經歷的主體脈絡，整理出了一條非常關鍵的線索，但各階段的具體情況以及相應的過程細節則暫付闕如。而通過文獻稽考，我們可對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經歷作出一些補充式的歷時性考察，不僅有助於對翁方綱研讀杜詩的過程作出更細緻、完整的階段劃分，同時也利於對翁方綱在不同階段具體從事的杜詩研究工作以及各個階段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特點，作出更為準確、全面的考量。

翁方綱“幼而從事”於杜詩，“自束髮誦詩，所見杜詩古今注本，已三十餘種”，⁶而其生平第一次接觸杜詩，確切的時間節點當為乾隆十三年(1748)秋，時翁方綱16歲。按其自撰《翁氏家事略記》所載：是年秋，在表母舅胡世鐸的勸導下，翁方綱開始學詩。而最先習讀的詩作，即杜甫及李商隱的作品。⁷因此，對於翁方綱而言，杜詩是詩學啓蒙式的讀物，是其詩學之路的發展起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往後翁方綱詩學與杜詩之間的淵源自此亦已肇其端。

之後較長一段時間內，翁方綱開始進入比較系統地閱讀和學習杜詩的階段。在此過程中，自宋至清的一些重要的杜詩注本，成為了翁方綱研讀杜詩最重要的參考書目和文本來源。按其《杜詩附記·自序》中自陳之語，翁方綱最早研讀的注杜文獻為宋代魯峕、黃鶴等注，既而又研讀《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九家注杜

4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105—108。以下引及此書文獻標點未盡從。

5 莫崇毅：《翁方綱〈杜詩附記〉初探》，《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頁90。

6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6，頁229。

7 翁方綱著，英和校訂：《翁氏家事略記》，吳洪澤等主編：《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冊41，頁331。

詩》，均為宋代知名的杜詩注本。而且據相關文獻記載，翁方綱也十分注重廣泛蒐集和閱讀各種不同的注杜本，如《恩縣道中讀杜詩》一首即記錄其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過恩縣，曾與好友錢維城論杜詩，時錢維城有《諸家評杜》一本，翁方綱於途中即借鈔之的經歷。⁸ 在此階段，翁方綱大概仍處於自覺和廣泛借鑒前人之解杜經驗，不斷從中吸收營養以充實自身關於杜詩之認知的狀態。

至乾隆丁丑（1757）、戊寅（1758）年間，館於蠡縣之時，翁方綱逐漸開始對諸家注杜評杜之語有所評判和擇取。而其中又以國朝先賢王士禛的評杜之論最得其激賞。翁方綱不僅遍讀王士禛所著三十六種書目，並且手自抄錄其中有關杜詩的評語，叢脞成書，彙為《漁洋杜詩話》一卷，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付梓於粵東使院。⁹

應該說，《漁洋杜詩話》付梓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大抵非關偶然，而是與翁方綱在這一階段研讀杜詩的狀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翁方綱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秋奉命提督廣東學政，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結束任職，奉命回京，前後任期凡 8 年。在視學廣東期間，翁方綱詩學也進入了高速發展和漸趨成熟的階段，而關於杜詩的閱讀、理解與體悟也明顯得到了較大程度的突破與提升。《石洲詩話》前五卷的編纂成書，即為明確的文本依據。

《石洲詩話》前五卷撰寫於乾隆三十年（1765）到三十三年（1768）間，¹⁰ 是翁方綱視學廣東期間寫就的詩話類專著。按其卷前自叙所言，此書實乃翁方綱巡試廣東諸郡時，與諸生講學論詩之札記，略同於現代意義上的詩學講稿的性質。¹¹ 而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石洲詩話》前五卷中已經明確包含了大量杜詩批評的話語。這首先直接證明了：在翁方綱巡試廣東諸郡時，在其與諸生論詩講學的過程中，杜詩是時常關涉到的重要話題；¹² 其次，就其中的杜詩批評內

8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 年），頁 20。

9 張忠綱等：《杜集叙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頁 309。

10 董岑仕：《翁方綱撰〈石洲詩話〉始末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 年第 3 期，頁 91—100。

11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自叙》，頁 21。

12 除了詩學講授之外，翁方綱也曾與諸生就杜詩進行詩學酬唱活動，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仲夏，翁方綱於韶州使院集諸生於堂，講杜甫《偶題》一篇，檢舊稿書後七律示之，疊韻二首，俾諸學官弟子和。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頁 47。

容來看,《石洲詩話》中不僅包含了數量可觀的對於單篇杜詩的解讀與評析,更可見翁方綱對於杜詩的特色、風格等整體性的總結、判斷與觀照;甚至還包括翁方綱對若干杜詩批注本(例如浦起龍《讀杜心解》、仇兆鰲《杜詩詳注》等)所作出的一些帶有明確臧否態度的評價。這些都直觀地反映了翁方綱在研讀杜詩方面日益精深的狀態。

其後大概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為一時間界點,翁方綱開始進入學術型研究杜詩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翁方綱摒棄諸家論杜之語,束之不觀,轉而依憑個人的學識及眼光批點杜詩,並以此建構起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杜詩學觀念,而最為集中和突出的表現即《翁批杜詩》一書。此書始撰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¹³大約完成於嘉慶五年(1800),¹⁴前後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撰寫時間,幾乎包蘊了翁方綱數十年間研讀杜詩的心得,直至其晚年,翁方綱仍時常回顧和誦讀其中的批注。¹⁵另外,在這一階段中,翁方綱先前以漁洋評杜為宗的觀念也明顯發生了轉變。成書於嘉慶五年(1800)至十七年(1812)間¹⁶的《漁洋評杜摘記》即為有力的文本例證。在《漁洋評杜摘記》中,翁方綱不僅對屢入漁洋評杜本的王士禛評杜之論作了明確的辨析與清理,同時也針對王士禛關於杜詩所作出的一些不當批評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偏頗立場作了強有力的批駁。可見此時翁方綱已然擺脫了原先對於漁洋評杜的絕對信從,逐漸培養和確立起了個人的論杜觀念。

縮結言之,翁方綱一生研讀杜詩的經歷大略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自乾隆十三年(1748)秋始讀杜詩,開始進入詩學啟蒙閱讀的階段;之後通過廣泛閱讀自宋至清各種杜詩注本開始進入系統研讀杜詩的階段;至乾隆二十二(1757)、二十三年(1758),始以王士禛論杜之語作為重要參考,其後在視學廣東期間

13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緒論》,頁15。

14 吳宏一:《清代詩話考述》(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上冊,頁558。

15 按: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著錄《杜詩附記》,云:“稿本,題大興翁方綱學。……前有識語:麻姑之爪可搔癢,陳琳之檄可以愈風。丙子六月二十一日,左足跌患不能伸動,誦此冊偶記。翁方綱(朱方)。”參見羅振常著,周子美編訂:《善本書所見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卷4,頁138。

16 董岑仕:《翁方綱撰〈石洲詩話〉始末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年第3期,頁91—100。

(1764—1771)在研讀杜詩上逐漸取得較大的進展與突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進入學術型研究杜詩的階段，不僅破除了對以往的杜詩評注本的依賴(尤其是對王士禛評杜之語的絕對信從)，轉而依憑個人的詩學見解評點杜詩，更嘗試以《翁批杜詩》為文字陣地，建構起個人的杜詩學觀念和理論系統。

二、讀杜論杜：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文獻學考察

在爬梳和整理了翁方綱一生研讀杜詩的若干階段及其特點後，接下來需要關注和解決的是翁方綱研讀杜詩的主要文本途徑以及相應的書籍來源問題。翁方綱可能閱讀過哪些杜詩相關的書目？他所掌握的有關杜詩的文本、觀念及知識，具體透由哪些文本路徑獲得？可能的書籍來源為何？這些問題都是釐清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知識背景和文本來源的關鍵。職是之故，我們有必要對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情況作一詳細的文獻學層面的考察，嘗試從文獻和閱讀史的角度，去還原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經歷和過程，以此推求其獲取杜詩知識、文本及觀念的主要的文本路徑以及可能的書籍來源。

前已述及，翁方綱自幼年即誦讀杜詩，而至遲到嘉慶十七年(1812)，其所寓目的杜詩古今注本已多達三十餘種。¹⁷ 雖然這一數據無法確斷為翁方綱一生所讀杜詩注本的總量，但至少證明了翁方綱研讀過的杜詩注本絕非寥寥，能為接下來的討論提供一些有效參考。而就具體考察的文本對象而言，作為翁方綱杜詩學研究的代表性著述，《翁批杜詩》傾注了翁方綱數十年的研杜心得，也最為集中和廣泛地記錄了翁方綱在研讀和批點杜詩過程中所寓目、評判或徵引過的杜集書目。因此，《翁批杜詩》將成為我們藉以考察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知識背景與文本來源的首選文本。

翻閱和爬梳《翁批杜詩》，其中翁方綱曾明確記錄、徵引或評判的杜集書

17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6，頁229。

目,主要指向以下 39 種:¹⁸

表 1 《翁批杜詩》中徵引和參考相關杜集書目統計

序 號	書 名	編 著 者
1	《杜工部小集》	[唐] 樊晃
2	五代後晉開運二年官書本杜集	官書本
3	《宋本杜工部集》	[宋] 王洙
4	《杜工部集》(吳若本/吳若校刊本)	[宋] 吳若校刊
5	徐鉉家本	[宋] 徐鉉
6	陳浩然本	[宋] 陳浩然
7	陳無己本	[宋] 陳師道
8	趙次公本《杜詩先後解》	[宋] 趙次公
9	呂祖謙選本	[宋] 呂祖謙
10	顧少冶本	顧少冶
11	王仲正本	王仲正
12	海鹽劉本	海鹽劉氏
13	高麗本	朝鮮傳本
13	《編次杜工部詩》	[宋] 魯崑
14	《杜工部詩注》	[宋] 師尹
15	《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	[宋] 黃鶴補注
16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宋] 劉辰翁批點,[元] 高楚芳編
17	《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	[宋] 徐居仁編次,黃鶴補注

18 按:《翁批杜詩》中仍有若干批注未詳所指何人或何書目,例如“鄭氏”、“姜氏”、“張氏”、“川本”、“楊”、“劉”、“李”,於《翁批杜詩》中均徵引一次,然所錄內容與仇兆鰲《杜詩詳注》同,姑存之以俟考。

續 表

序 號	書 名	編 著 者
18	《九家集注杜詩》	[宋] 郭知達編
19	《杜工部草堂詩箋》	[宋] 蔡夢弼撰,宋槧本
20	《東坡杜詩故事》	宋人已辨其僞,即所謂“僞蘇注”。
21	《杜詩箋》	[宋] 黃庭堅
22	《注杜詩補遺正繆》	[宋] 杜田
23	《杜詩正異》	[宋] 蔡興宗
24	《杜工部五言趙注》	[元] 趙沅
25	《杜臆》	[明] 王嗣爽
26	王遵巖手評本	[明] 王慎中
27	《杜律選注》	[明] 范濂
28	《箋杜陵詩》	[明] 董斯張
29	《杜工部詩集輯注》	[清] 朱鶴齡
30	王士祿評本	[清] 王士祿
31	《杜詩詳注》	[清] 仇兆鰲
32	《杜律評語》	[清] 李因篤
33	《杜詩闡》	[清] 盧元昌
34	《杜詩說》	[清] 黃生
35	《杜詩解意七言律》	[清] 朱瀚
36	《杜詩會粹》	[清] 張遠
37	《關疆園杜詩注解》	[明] 顧宸
38	《讀杜心解》	[清] 浦起龍
39	《全唐詩》本杜詩四冊	[清] 彭定求等編,得自錢棨

由上觀之,翁方綱在批點杜詩的過程中,參考和徵引的文本來源較為豐富和廣泛,不僅包括了相當數量的唐、宋時期的杜甫詩集,也參考了不少自宋至清的杜詩集注本、注本、選注本、評本等。這是《翁批杜詩》中有關翁方綱書目參考和研讀情況的最直觀的反饋。

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知識的獲取,有所謂的文本來源與書籍來源之分,¹⁹兩者之間明確存在差異和分化的可能。也就是說,翁方綱在《翁批杜詩》中所徵引的上述文獻書目,事實上未必是其一一研讀和參閱原書的結果,很可能是其引證自若干編纂類、彙編類著述而成的產物。一個明確的文獻例證是:表格中的部分書目(例如樊晃《杜工部小集》、《五代後晉開運二年官書本杜集》、師尹《杜工部詩注》等)原書在翁方綱之時已亡佚不存,沒有單行或叢刻的刊本、鈔本流傳行世,而有賴於集注本、彙編本的輯錄才得以留存吉光片羽。在這種情況下,翁方綱通過原書獲取相應文本和知識的可能性本就微乎其微。

而通過校對《翁批杜詩》中所援引的這些文本和史料,可以發現,這些文本真實的書籍來源,應當是清代前期仇兆鰲所編《杜詩詳注》。以師尹《杜工部詩注》為例:《翁批杜詩》中徵引師尹本僅一處,其於《晚晴》“高唐暮冬雪壯哉”一句“高唐”下批注:“舊作‘堂’,師尹改作‘唐’。”²⁰仇《注》此詩此句下批注同,亦作:“舊作‘堂’,師尹改作‘唐’。”²¹又如王嗣奭《杜臆》,此書成書後並未以刊本或鈔本流傳面世,直至仇兆鰲《杜詩詳注》大量徵引後始引起關注。《翁批杜詩》中徵引《杜臆》凡 16 處,內容均未出仇兆鰲《杜詩詳注》所引範圍,例如翁於《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丹梯庶可凌”一句“凌”字下注:“《杜臆》作‘凌’,他本作‘陵’。”²²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是詩此句下亦見“《杜臆》作‘凌’,他本作‘陵’”。²³又如蔡興宗《杜詩正異》。此書久佚不存,《詩話總龜·正訛門》輯有三十二條佚文;而《杜詩詳注》中亦時見徵引。《翁批杜詩》中徵引《正異》

19 有關文本來源與書籍來源的區分,參看葉曄:《〈牡丹亭〉集句與湯顯祖的唐詩閱讀——基於文本文獻的閱讀史研究》,《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頁174—183。

20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682。

21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1,頁1847。

22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162。

2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頁64。

凡 23 處，就所注內容來看，基本襲用了仇兆鰲《杜詩詳注》的注語，例如《翁批》於《哀江頭》“一笑正墜雙飛翼”一句“笑”字下注：“《正異》作‘笑’，別本作‘箭’，蔡君謨作‘發’。”²⁴於《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鼓角漏天東”一句“漏”字下注：“舊作‘滿’，《正異》及《英華》皆作‘漏’。”²⁵均與仇兆鰲《杜詩詳注》所注同。

事實上，《翁批杜詩》與仇兆鰲《杜詩詳注》的文本關聯，已有學者關注到。賴貴三在校釋《翁批杜詩》的過程中已明確提出，翁方綱的《翁批杜詩》實以仇兆鰲《杜詩詳注》為底本。²⁶而通過文本對校確認，翁方綱在具體收錄的杜詩篇目、排列順序、字句版本等方面，大都以仇兆鰲《杜詩詳注》作為直接參考。尤其在字句版本的問題上，翁方綱在很大程度上都襲用了仇兆鰲《杜詩詳注》的成果，這就證明了《翁批杜詩》在看似擁有較為豐富和廣泛的文本來源的表象之下，事實上指向的是較為集中和小範圍的書籍來源。而《杜詩詳注》正是翁方綱研讀杜詩、寫就《翁批杜詩》一書，最直接和主要的參考書目。

不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雖然《翁批杜詩》在杜詩篇目、排列順序、字句版本等方面多以仇兆鰲《杜詩詳注》為直接參考，但他並未完全遵照仇《注》的意見，在若干字句的校定問題上，翁方綱仍採用了與仇《注》不同的版本，例如：《翁批杜詩》中《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第十二句原作“王翰願為鄰”，原注：“陳作‘為’，一作‘卜’。”後又圈去“一作‘卜’”，並改原詩“為”作“卜”，定作“王翰卜為鄰”。²⁷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是詩此句即作“王翰願為鄰”，且“為”字下批注：“陳作‘為’，一作‘卜’。”²⁸可見翁方綱原依據仇兆鰲《杜詩詳注》之版本，後又據別本有所修改；又《翁批杜詩》中《解悶十二首（其十）》第三

24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224。

25 同上，頁 428。

26 須注意的是，《翁批杜詩》對杜詩的分卷作了新的調整，將原先仇兆鰲《杜詩詳注》二十五卷，重新釐作詩二十卷、文一卷。又，賴貴三雖然提出了《翁批杜詩》以仇兆鰲《杜詩詳注》為底本的論斷，但並未細考兩個本子之間的文本關聯，僅提出結論，而並未提供論證過程。《翁批杜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參考和襲用了《杜詩詳注》的成果，兩個本子之間具體存在何種文本關聯？皆有待進一步考察和釐清。

27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165。

28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頁 74。

句作“京中舊見無顏色”，²⁹而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七是詩此句作“京華應見無顏色”。³⁰《翁批杜詩》錄《贈衛八處士》第 15 句作“問答乃未已”，³¹而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六是詩此句作“問答未及已”。³² 這些異文證明了翁方綱在以仇兆鰲《杜詩詳注》為底本的同時，在少量字句的校定問題上明確依循了其他杜集的版本。

雖然翁方綱並未明確標記所依據的究竟是哪一種杜集書目，不過結合翁方綱自序所言、《翁批杜詩》中的批注，以及特定的異文情況，可知翁方綱所參校的本子，或即《全唐詩》本杜詩四冊。

翁方綱曾於自序中言：“後乃見吳下有專刻《杜詩》全文，無注釋之本，便於攜閱。庚戌以後，內閣廳事，每於待票簽未下時，當午無事，則以此本覆核，如此者又十年。”³³可知，翁方綱曾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於吳下購得白文杜集本，並且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後，多以此白文杜集本覆核《翁批杜詩》，作為釐定杜詩字句版本的重要參考。因此，參校本為“專刻《杜詩》全文，無注釋之本”，購買地點為吳下（即蘇州），時間當於乾隆十五年（1790）之前，便成為了考定翁方綱所使用參校本的重要線索。

而最為關鍵的是，《翁批杜詩》與《杜詩詳注》所出現的異文情況，在《全唐詩》本《杜詩》中也可以得到明確的驗證。除了前文所列的異文情況，《翁批杜詩》中還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例證：例如《翁批杜詩》中《元都壇歌》第 6 句作“青石漠漠常風寒”，³⁴仇兆鰲《杜詩詳注》是詩此句作“青石漠漠松風寒”。³⁵《翁批杜詩》於《雷》第 14 句作“鞭巫非稽古”，³⁶仇《注》中此句作“鞭石非稽

29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574。

30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7，頁 1517。

31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274。

32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6，頁 513。

33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108。

34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179。

35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2，頁 135。

36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510。

古”。³⁷《翁批杜詩》中《法鏡寺》第5句作“嬋娟碧鮮淨”，³⁸仇《注》是詩此句作“嬋娟碧蘇淨”。³⁹《翁批杜詩》中《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其二)》第3句作“杳杳東山攜漢妓”，⁴⁰仇兆鰲《杜詩詳注》中作“杳杳東山攜妓去”。⁴¹而經過對校，這些與《杜詩詳注》明確相異的字句，正與《全唐詩》本《杜詩》中所錄版本相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翁方綱在斟酌杜詩版本優劣的過程中，除了參考仇兆鰲《杜詩詳注》之外，也曾以錢棨所提供的《全唐詩》本《杜詩》作為釐定杜詩版本的重要參考。

另外，還應指出的一點是，雖然《翁批杜詩》中有相當數量的徵引文本，皆轉錄自仇兆鰲《杜詩詳注》一書，但通過文獻對校可知，其中也有部分杜集書目，翁方綱大概率參考過原書，至少曾經翻閱或接觸過原書紙本。以下以《杜工部草堂詩箋》宋槧本以及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為例試加說明。

《杜工部草堂詩箋》，宋蔡夢弼箋注，為杜詩編年集注本，影響頗大。《翁批杜詩》中徵引是書內容較多，凡21次，可見《翁批杜詩》對此本的看重。翁方綱曾撰文記錄有關宋槧本《杜工部草堂詩箋》的考證心得，有《跋宋槧草堂詩箋》、《又跋杜工部草堂詩箋》兩篇跋文留存，可證其一定曾接觸過宋槧本《杜工部草堂詩箋》這一實體文獻。而從《翁批杜詩》的批注中，我們也可以找到相應的一些文獻佐證：首先，《翁批杜詩》中存在見於草堂本而未見於《杜詩詳注》的批注：《翁批杜詩》於《嶽麓山道林二寺行》“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兩句下注：“草堂本‘公自注’云：宋之問之貶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⁴²而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十二此詩下未見此注；其次，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十一於《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詩題下注：“一本作‘鄭公枉駕攜饌訪水亭’”⁴³而《翁批杜詩》於《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詩題下注：“草堂本一

3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5，頁1296。

38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321。

39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8，頁682。

40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432。

41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2，頁1029。

42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726。

43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1，頁903。

作‘鄭公枉駕攜饌訪水亭。’”⁴⁴《杜詩詳注》並未點明此注源於草堂本而僅云“一本作”，而翁方綱則將其具體落實到了草堂本，可見翁方綱確曾查閱過《杜工部草堂詩箋》，而且很大機會在批點杜詩的過程中參考過宋槧本原書。

又如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翁批杜詩》中徵引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僅一處，翁於《登兗州城樓》旁批：

顧宸曰：“《輿地廣記》：‘隋大業二年，改兗州爲魯郡。唐武德，克徐圓朗，復曰兗州。天寶元年，又改魯郡；至乾元元年，復爲兗州。’今日兗州，當是開元二十三年，公下第後，游齊、趙時所作。”⁴⁵

此段批注的文本來源即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翁批杜詩》所引除刪去末尾“壯遊詩所云‘忤下考功第，放蕩齊趙間’是也”⁴⁶一句外，其餘文字與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卷一所載批注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仇兆鰲《杜詩詳注》亦徵引此注，然內容較原文有較大刪改，作：“顧宸注：‘兗州，隋改爲魯郡，唐武德間復曰兗州，天寶元年又改魯郡。此云兗州，當是開元二十五年，公下第後遊齊趙時所作。’”⁴⁷而核驗其他杜詩集注本、批注本，僅《補注杜詩》亦徵引是則史料，然原文作：“鶴曰：《輿地廣記》：隋大業二年，改兗州爲魯郡。唐武德，克徐圓朗，復曰兗州。天寶元年曰魯郡；舊史上元年復爲兗州。今公以開元二十四年前下第後遊齊趙至此，故曰兗州詩當作於開元二十九年之前。”⁴⁸與《翁批杜詩》所注文字明確有所出入，據此大抵可判斷，翁方綱應該有參考和閱讀過《關疆園杜詩注解》原書。

此外，也有一些批注文字，原書已佚，又並未見錄於《杜詩詳注》中，很可能是翁方綱生平研讀和蒐集杜詩評注資料之所得。如《翁批杜詩》中所錄李因篤

44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395。

45 同上，頁 149。

46 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康熙二年刻本），卷 1，頁 1a—1b。

4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1，頁 5。

48 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卷 1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冊 1069，頁 337。

的評語。翁方綱於《十七夜對月》一詩下批注：“李天生云：‘杜詩“秋月仍圓夜”，正是說不圓，此乃下字法也。’”⁴⁹李天生，即李因篤，字天生，又字子德，明諸生，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撰有《杜律評語》一書，然流傳未廣，早已散佚。核查其他清代杜注本，均未見徵引李因篤此語。而按陳伯海、朱易安主編《唐詩書目總錄》所載，《杜詩詳注》二十五卷山西藏本有翁方綱錄趙香祖臨王士禛、李因篤等人批語，存十三卷。⁵⁰故翁方綱極可能通過趙香祖所臨李因篤評杜語間接得見李因篤《杜律評語》之吉光片羽，因而有機會將其錄入《翁批杜詩》中。

綜上，以《翁批杜詩》為考察文本，有關翁方綱研讀杜集書目的情況，大抵可以總結出四點特徵：第一，就文本來源而言，翁方綱在批點杜詩的過程中參考了相當數量的杜集書目，包括自唐至清的一些杜甫詩集、集注本、注本、選注本、評本等，文本來源較為豐富和廣泛；第二，就實際的書籍來源而言，仇兆鰲《杜詩詳注》是《翁批杜詩》最直接和重要的參考書目，《翁批杜詩》中所彙集的不少不同來源的文獻史料，事實上都轉錄自《杜詩詳注》一書；第三，除《杜詩詳注》之外，翁方綱也曾以錢棨所提供的《全唐詩》本《杜詩》四冊為參校本，作為釐定杜詩字句版本的重要參考；第四，翁方綱生平經眼和蒐集的杜詩相關資料（例如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宋槧本以及李因篤評杜語等）也為其批點杜詩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來源。

三、吸收、批判與轉化：翁方綱研讀杜詩的進境與知識架構的建立

考察完《翁批杜詩》所涉及的文本來源及相應的書籍來源問題後，接下來需要關注和解決的是翁方綱杜詩學的知識架構問題。翁方綱對於杜詩的理解與認識是如何形成的？有關於杜詩學的知識架構究竟如何得以建立？其中是

49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650。

50 陳伯海、朱易安編撰：《唐詩書目總錄（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冊上，頁 444。

否存在某些重要的介入因素？這些都是本小節嘗試去解答的問題。職是之故，我們有必要重新還原和進入翁方綱研讀杜詩的“過程”，在翁方綱研讀杜詩的過程中，具體把握和推演其杜詩學知識框架的建構問題。⁵¹

按照之前的文獻爬梳與整理，翁方綱一生研讀杜詩的經歷，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幼年時的啓蒙閱讀；遍讀諸家評注本的廣泛習讀；以王士禛評杜為準的細讀精讀；以及束諸家評注不觀而以己意批杜的學術研讀。其中不難發現，翁方綱在研讀杜詩方面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轉折，除第一次自幼年啓蒙閱讀至青年參閱諸家評注本的常規性變化之外，其餘兩次轉折，均與王士禛密切相關，一次是由廣泛閱讀各家注本轉而以漁洋評杜為宗；而另一次則走出漁洋評杜的思維局限，轉而以個人的詩學邏輯及學術眼光來批點杜詩。事實上，這兩次重要的轉折，已經映射出了翁方綱在研讀杜詩過程中的兩次進境，以及王士禛及其杜詩學觀在翁方綱杜詩學形成和定型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按《杜詩附記·自序》所言，翁方綱以漁洋論杜為宗，約莫始於乾隆二十二（1757）、二十三年（1758），館於蠡縣之時。⁵² 在這一階段中，翁方綱在廣泛閱讀自宋至清的諸多杜詩評注本後，唯獨對王士禛的評杜之論擊節歎賞，並奉為讀杜解杜之圭臬。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翁方綱在解讀和評論杜詩方面，第一次確立了比較明確的標杆和方向。

翁方綱以漁洋論杜為宗大約肇始於《漁洋杜詩話》一書。其《刻漁洋杜詩話成寄內四百八十字題卷上》一詩中有“是書哀輯日，及在蠡吾鄉”⁵³的記述，表明此書正編於乾隆二十二（1757）、二十三年（1758）前後。翁方綱詳細爬梳了《王漁洋遺書》中三十六種著述，一一析出其中有關評杜論杜的言論，凡一百四十七條，按其評論主題及體裁，分作“總論”、“論古體”、“論近體”、“論注

51 按：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第五章論及翁方綱對王漁洋詩學的接受與揚棄這一重要議題，其中也關涉到了杜詩的部分，例如指出翁方綱學詩最初是由杜甫入手的，因整理王漁洋的杜詩評論而接觸其詩學，詳細考辨漁洋與西樵的杜詩論等。參見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頁566—586。

52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106。

53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卷5，《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82，頁403—404。

家”、“論學人”、“雜論”、“語資”七大類目，彙編成《漁洋杜詩話》一書。⁵⁴ 值得關注的是，《漁洋杜詩話》在編成後並未馬上刻印行世，一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始刊行於粵地。從袁輯彙編到刊刻印行，中間相隔近 10 年之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漁洋論杜”不僅對翁方綱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而且持續的時間較長，至少在《漁洋杜詩話》付梓前後，翁方綱仍對“漁洋論杜”持極大的肯定態度，否則他也不會在此書編成近十年後，仍將其上板刊行，以饗後學。而這一點，在《石洲詩話》前五卷中，也可以找到明確的印證。

《石洲詩話》前五卷作為翁方綱早期代表性的詩學著述，集中反映了翁方綱對唐、宋、金、元四代詩人詩作的認識，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對於杜甫詩作的解讀與評價。是書前五卷撰寫於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三年（1768），正與《漁洋杜詩話》付梓時間相近。而從《石洲詩話》具體記述的內容來看，我們也可以明確梳理出翁方綱在評杜方面所受到的王士禛的影響，尤其是王士禛辨體意識在《石洲詩話》中的接受和延伸。

翁方綱曾直接徵引漁洋辨詩內容的話語至《石洲詩話》中，不僅表示認同，更有意加以深化：

（漁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敘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⁵⁵

王士禛以詩作內容及風格辨諸家，以阮籍、陳子昂為感興之代表；以王維、韋應物為山水閒適之宗；以杜甫為鋪陳敘述之翹楚，翁方綱頗以為是。他認為，由作家之“意”定作品之“格”，是以詩作風格辨作者的內在理路；同時，翁方綱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推演，他提出：若是作品之“格”由作者之“意”而生，那麼作品

54 按：《漁洋杜詩話》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蔣寅編《清代詩話珍本叢刊》收入影印本，即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參見蔣寅編：《清代詩話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第1輯，冊40。

55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1，頁36。

之“句”自然也當由作品之“格”而生。因此,不同詩人所創作的詩句也必定體現出不同的風格特性,如李白“十二樓五城”此等瀟灑恣肆、宏闊盛大的句子斷不可雜入韋應物恬淡清遠、閒適平和的詩句中,不僅將“辨體”意識落實於詩作風格層面,更向前推進一步,將“辨體”意識貫通到語言和文字層面。這是翁方綱對王士禛“辨體”意識的直接吸收和正面響應。

再來看翁方綱從“辨體”角度評杜的論斷:

杜五律雖沉鬱頓挫,然此外尚有太白一種暨盛唐諸公在。至七律則雄關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允爲此體中獨立之一人。⁵⁶

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照,蓋盡有建安、黃初之實際,而並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⁵⁷

杜五律亦有唐調,有杜調。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導上下之脈,溯初、盛、中之源流,則其一種唐調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內《贈衛八處士》之類,何嘗非選調?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⁵⁸

與漁洋評杜注重辨體的特徵相似,翁方綱在評價杜詩的風格特色及藝術成就時,同樣採用的是先“辨體”再評論的思路,分別就五、七言,古、近體等不同詩歌體裁,對杜詩作出具體的評價,講求在不同的詩體脈絡中,實現對杜詩的精準定位;而翁方綱對杜詩五律的“唐調”、“杜調”之分,應該說正是對王士禛源自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辨體意識的轉化。王士禛曾在答弟子問中表示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一語確爲定論,⁵⁹從辨家數、源流的角度,對五言古詩的發展譜系作了新的釐定,認爲唐代的五古與漢魏六朝的五古明確有所區別,應作分別觀;而翁方綱就杜甫的五律作“唐調”、“杜調”之分,事實上遵循的仍是相同的辨體思路,關注的是杜詩五律於唐五律中所分

56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1,頁49。

57 同上,頁42。

58 同上,頁46。

59 郎廷槐問,王士禛等答:《師友詩傳錄》,丁福保輯錄:《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冊上,頁129。

化之“變”。這是翁方綱以漁洋論杜為宗的主要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王士禛在“辨體”的前提下，對杜詩的寫作特色及創作技法作了鮮明的定位，即“鋪陳直叙”、“以雄辭直寫時事”。⁶⁰ 這一點翁方綱也明確有所吸收：

《陪姚通泉宴東山》一首，即《漢陵行》也。更不用湘妃、漢女等迷離之幻字，而直用真景，則晚年之境更大也。⁶¹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於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既大，故能於尋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鏞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不可學者。⁶²

大約古今詩家，皆不敢直擣鼓心，惟李、杜二家，能從題之正面實作。⁶³

翁方綱不僅沿襲了王士禛所強調的杜詩注重“鋪陳直叙”的特點，肯定杜詩能直寫時事、景物，更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拈出了“正面實作”、“正位鋪寫”的概念，一則加強了杜詩的創作特色與“鋪陳直叙”之間的連結，使得這一寫作技法在學理層面及實踐層面都獲得了有力的加持；二則也借“正面實作”的特點將杜詩推向更高的詩學地位。可見翁方綱在吸收漁洋論杜之精髓的同時，也有所延伸和發展。

以上分析了翁方綱於《石洲詩話》中對漁洋論杜的吸收和接受。翁方綱早期以漁洋論杜為宗，最主要的兩個表現：一是繼承了王士禛以“辨體”論杜的方法和邏輯；一是吸收並且進一步發展了杜詩注重“鋪陳直叙”的特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翁方綱“以漁洋論杜為宗”會成為其杜詩學研究中的第一次進境。翁方綱以漁洋論杜為宗，正意味著他在評杜論杜方面開始有了明確的標桿和方向，明確以“辨體”為導向，在杜詩批評方面有所選擇和側重。雖然

60 郎廷槐問，王士禛等答：《師友詩傳錄》，丁福保輯錄：《清詩話》，冊上，頁143。

61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1，頁46。

62 同上，頁42。

63 翁方綱：《與友論太白詩》，《復初齋文集》，卷11，《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82，頁117。

這些觀念來源於王士禛，但它們都實實在在地滲透到了翁方綱的杜詩批評當中，不啻為翁方綱杜詩學的一大進步和突破。

翁方綱杜詩學的第二次進境，即走出漁洋論杜的思維局限，開始以個人的詩學眼光和邏輯研究杜詩。從時間上來說，大概肇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翁方綱始撰《翁批杜詩》之時。

而之所以以《翁批杜詩》作為翁方綱走出“漁洋論杜”思維局限的標誌，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的考慮：

第一，與《石洲詩話》多以漁洋詩論為準的不同，《翁批杜詩》中已極少見翁方綱參考和援引漁洋論杜之說。據統計，《翁批杜詩》中出現“漁洋”相關字眼凡8次，除去《從人覓小胡孫許寄》一首的版本問題，翁方綱表示認同漁洋的看法外，其餘提及漁洋處，翁方綱都提出了批駁意見，例如：翁方綱於《宗武生日》一首下批注：“精微期託，全在一‘理’字，似非漁洋所知。”⁶⁴又就《解悶十二首》(其七)闡發：“此間即離之秘，蓋亦難傳。而漁洋乃以蕪累斥之，又非定評矣。”⁶⁵又云：“至漁洋之議《八哀》詩，則漁洋之誤耳。”⁶⁶上述徵引漁洋詩論的數量以及相關批注所持有的批評立場和臧否態度，都較為直觀地反映出翁方綱對“漁洋論杜”態度的陡轉，他不再以“漁洋論杜”作為重要參考，甚至更於批注中多加批評和指摘。

第二，翁方綱開始走出漁洋論杜的思維局限，主要原因在於，他認識到了“漁洋論杜”的局限性，在對此有了一番相對深入、客觀的認知後，他開始擺脫以往對漁洋詩論的盲從態度，重新樹立個人對於杜詩的理解與認知，並嘗試藉助對“漁洋論杜”話語的辨正，來為自己的杜詩批評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

翁方綱曾於《杜詩附記·自序》中直陳漁洋論杜之弊：“漁洋之言詩，得詩味矣，深繹而熟思之，此特漁洋之詩耳，非盡可以概《杜詩》也。”⁶⁷應該說，這段話已經點明“漁洋論杜”有其局限性，但所論仍有所保留，僅言其不足以對杜詩

64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554。

65 同上，頁576。

66 同上，頁372。

67 同上，頁106—107。

作出全面、公允的論說，而尚未明辨漁洋詩論之局限究竟為何。而在具體的杜詩批語中，則更可見翁方綱直言不諱的批評：“《八哀》詩，《漁洋詩話》竟評其冗雜不成章，又以吟嚙語目之。蓋漁洋于詩，專取輕圓俊利之句，于杜法無當也。”⁶⁸翁方綱認為漁洋之所以會對杜詩作出失當的批評，正源於王士禛詩學本身偏頗的價值取向和理論局限。漁洋論詩有其明確偏好，傾向於選取輕圓俊利的語句，而未能參透和領悟杜詩詩法，因此無法對《八哀》詩作出準確公允的評價。而在《七言三昧舉隅》中，翁方綱對《唐賢三昧集》不選李、杜詩問題的解釋，更透徹深入地揭露了漁洋論杜的局限：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詩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為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為此托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為主，不欲以雄鷲奧博為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鷲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為詩家正軌也。而其沈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⁶⁹

翁方綱指出，王漁洋論詩偏重沖和淡遠一脈，在詩歌風格上明顯有其偏好和去取，不喜杜詩“雄鷲奧博”之格，更不欲以此為唐詩正宗，這是《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詩的根本原因。但是礙於李、杜在詩歌史上早已確立的典範地位，二家列於詩家正軌已是詩壇共識，因此王漁洋只能藉“仿王安石《百家詩選》之例”為說辭，粉飾不錄李、杜詩的真實原因。這說明，翁方綱已然看到了漁洋詩論的局限性，正由於漁洋論詩主“神韻”，講求沖和淡遠的審美風格，因此他無法對不屬於沖和淡遠一脈（甚至相去甚遠）的杜詩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

應該說，翁方綱能夠認識到漁洋詩論的局限性，並且願意公開加以批評和指陳，已經成功邁出了走出“漁洋論杜”思維局限的第一步；不過翁方綱並未止

68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539。

69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5，頁 60—61。

步於此,他也嘗試藉助批評漁洋詩論的契機,為個人的杜詩批評及詩學理論鋪路:

王新城《居易錄》云:樓攻媿《答杜仲高書》云:杜《留花門》“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蓋“花門”即“回鶻”。嘗考回鶻之俗,衣冠皆白,故連屯左輔百里,如積雪然也。此條新異可喜。

愚按:此條非新異也。上句“連雲”虛,而此句“積雪”實也;上句“左輔”實,而此句“百里”虛也。有此“積雪”之實致形容,乃覺上句“連雲”之虛寫,為有著也。即此上、下句雲雪之參差蹉對,而句法之理在焉,此之謂“熟精《選》理”也。漁洋先生乃目攻媿樓語為新異,此故其所以答門人問“熟精《文選》理”,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者,而何以訓詩學乎?⁷⁰

這是翁方綱在杜詩《留花門》一首下的批注。他首先援引了王漁洋《居易錄》中有關《留花門》的評論,但援引的目的不在於參考和引證,而在於批駁和另作伸說。在翁方綱看來,漁洋《居易錄》中轉引樓鑰《答杜仲高書》對“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的注解,事實上並未觸及此詩的價值核心。翁以為,詩中“連雲”與“積雪”,“左輔”與“百里”虛實相生,參差蹉對,此間所包蘊的句法之理,才是此詩的精詣所在。值得關注的是,翁方綱在另作伸說之後,還不忘藉機針砭“漁洋所言‘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的論斷之弊,進一步將矛頭指向王士禛對“理”的理解與辨說上。

王士禛曾答弟子有關杜詩“熟精《文選》理”“理”字之說,曰:

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蘇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為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耳。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

70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284—285。

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⁷¹

漁洋認爲，杜詩“熟精《文選》理”所論之重心乃在《文選》，而非“理”字。因此他雖然認可並強調《文選》學的重要性，但對於詩中所言之“理”字，則抱持一種不必深求其解的態度。翁方綱對此頗有異議，不僅在杜詩批點中多加批駁，更專門撰寫《杜詩精熟文選理字說》一文對此問題進行剖析和回應。而“理”正是翁方綱學人詩論中的重要概念，對“理”字的推闡講解也正爲翁方綱建構個人詩學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由此亦可見翁方綱走出漁洋論杜的思維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個人詩學的發展。

第三，研讀《翁批杜詩》可知，翁方綱此時評杜論杜已呈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同時其解讀杜詩的關注點及重心也明顯有所偏向和轉移。與以往杜詩評注本注重解讀杜詩本事、典故、情感、思想等不同，《翁批杜詩》明確將關注的重心轉置到了文本組織和詩歌技法層面，以一種“更迫近的文本觀察”，⁷²研讀杜詩之精髓，更欲藉此實現探求“詩之所以爲詩”⁷³奧義的宏大理想。這說明，翁方綱對杜詩的理解和認知正趨於深化和系統化。他開始建立起個人的杜詩批評系統，並且在此基礎之上逐漸建構起學人詩論體系。

四、餘論：清中期杜詩的閱讀史圖景及其局限

翁方綱研讀杜詩過程與經歷的考察，不僅有助於我們還原和推演翁方綱杜詩學知識架構的形成過程，同時也爲我們探究清代乾嘉時期一般官僚型及學者型文人的杜詩閱讀情況提供了一個典型且堅實的案例。透過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文獻考索與過程還原，我們可以對乾嘉時期文人的杜詩接受問題有更局部、微觀和細節性的討論，同時亦可嘗試對清代中期杜詩的閱讀史圖景作一

71 郎廷槐問，王士禛等答：《師友詩傳錄》，頁 129。

72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年），頁 553。

73 翁方綱：《杜詩附記自序》，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 108。

些合理的推測以及延伸性思考。

作為清代中期一位典型的官僚型及學者型文人，翁方綱研讀杜詩的文本渠道、書籍來源以及具體的實踐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當時館閣文人研讀杜詩真實存在的個案情形以及可能存在的一般狀態。他通過何種方式研讀杜詩，具體閱讀哪些書目理解和研讀杜詩？其中是否存在客觀的時代及物質局限？有無主觀或被動的選擇和放棄？這些問題作為一些閱讀史碎片，正可藉以勾勒清中期杜詩的閱讀史圖景之一角。

在前文的討論中，翁方綱研讀杜詩所呈現的最顯著的特徵是，他研讀和參考過大量杜詩評點、批注、集注本。這些批注及解讀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滋養翁方綱杜詩學成就的重要養分，為其後期的杜詩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學養基礎，這一點大概無可非議。不過在這裏，筆者嘗試將關注點往前回退一步，將討論的重心回置到翁方綱對杜詩評點、批注、集注本的選擇上。而提問的關鍵不在於他究竟選擇了哪些杜詩評本、注本，而在於他為什麼選擇的是杜詩評本、注本，而非白文的杜甫詩集？或者更直接地說，翁方綱在當時選擇杜詩注本、集注本作為研讀材料，是否純粹是出自主觀意願的選擇？抑或是含有被動接受的成分？而產生這一懷疑的源頭，是翁方綱所記述的有關杜集的三則史料：

詩法上下千年，必於杜是程。聞閩中人家有藏宋槧吳若本者，顧若本亦不精。予近注杜，已得千五百餘條，皆向時注家所未及，惟未獲善本校勘耳。(乾隆四十一年)⁷⁴

杜、蘇二集，尊處可能有未動筆之本否？如有，即供一用。專此，不一不一。或能轉借否？恕具。(致趙懷玉)⁷⁵

錢湘舲送來《全唐詩》內之《杜詩》四本，內有可作定本者。當取與此細

74 沈津：《翁方綱年譜》，頁95。

75 翁方綱著，沈津輯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584。

對。此冊看定。乙巳端午前一日。(乾隆五十年)⁷⁶

第一則史料撰寫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為翁方綱開始批注杜詩的第三年。按翁氏自述,其批注杜詩的進度非常理想,但遺憾未能獲得杜集善本以便進行字句校勘;第二條史料是翁方綱寫給好友趙懷玉的書信,內容為翁向趙轉借杜甫及蘇軾的詩集,而“未動筆之本”則強調了翁氏所求之本乃不帶有任何批點、注釋的白文詩集;第三則史料繫於乾隆五十年(1785),翁方綱記述了從好友錢棨處獲得《全唐詩》杜詩本四冊的經歷,欲以之作爲《翁批杜詩》校定字句之參考。

前已述及,翁方綱大約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批點杜詩,且《翁批杜詩》所用之底本,乃仇兆鰲《杜詩詳注》一書。而通過以上三則史料可知,第一,翁方綱在批點杜詩之初就有意尋求杜詩白文善本以校定字句,不過一直求而未得;第二,他曾為尋訪杜甫白文詩集而付出過努力。趙懷玉為清代著名藏書家,所庋藏書富於一時,翁方綱特意致書趙氏求取白文杜集善本,可見當時白文杜集善本之不易獲取;第三,翁方綱最早於乾隆五十年(1785)經由錢棨獲得《全唐詩》杜詩本四冊,作為《翁批杜詩》之校本,而此時距離其開始批點杜詩、初次感歎未獲杜集善本以便校勘時已達十年之久。由以上細節觀之,我們需要對翁方綱選擇閱讀杜詩評注本、集注本的行爲抱持一種警惕的態度。我們有必要認識到:翁方綱研讀杜詩評本、集注本,甚至以仇兆鰲《杜詩詳注》為底本完成《翁批杜詩》一書,或許未必純粹是出於主觀意願的選擇,也可能是基於未獲得白文杜集善本這一客觀限制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而翁方綱作為清代中期有名的官僚型、學者型文人,他所能獲取的書籍資料和文化資源,已遠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企及。如果對於翁方綱而言,獲取白文杜甫詩集尚且是一件頗有難度的事情,那麼對於一般文人士子而言,更是一項難上加難的挑戰了。而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通過考察杜集在乾嘉時期的流傳形態來加以佐證。

⁷⁶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頁87。

據孫微《清代杜詩學文獻考(增訂本)》所考,目前已知的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杜詩學相關文獻凡 137 種(見存書目 64 種,散佚書目 73 種),其中包含大量的全集批點本、評注本、選本、選評本、集杜本、年譜等,甚至還包含一些雜劇、傳奇(例如曹錫黼《四色石·同谷歌》、夏秉衡《詩中聖》等)。而明確為白文杜詩全集而刊行於世者,僅鄭澐《杜工部集》二十卷一書。⁷⁷ 是書係據錢謙益《杜工部集箋注》而成,刪去原序、略例及箋注文字,僅錄杜詩白文及校語,初刻於乾隆五十年(1785)。雖然無法確證乾嘉時期所有杜詩學文獻皆已囊括其中,但從孫微所纂輯的杜詩學文獻情況來看,乾嘉時期杜集多以注本、集注本、評本的文獻形態流傳,而少見白文杜詩全集,應當是比較可靠的推論;另一方面,杜詩研究於有清一代達到第二次發展高峰,而清代杜詩學的主要成就集中於清代前期,重要的幾部杜詩評注本例如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張潛《讀書堂杜詩注解》、仇兆鰲《杜詩詳注》、浦起龍《讀杜心解》等,皆成書於乾嘉之前。尤其是仇兆鰲《杜詩詳注》一書,可謂有清一代杜詩研究集大成之作,對後世杜詩學影響深遠。這一背景大概也對乾嘉時期的杜集傳播以及杜詩研究走向產生了一定導向作用。

因此,藉由以上論述,我們大抵可以得出以下推論:在乾嘉時期,杜集流傳的文獻形態以各類批點本、注本、集注本為主,此類本子較為通行,容易獲取,而白文杜甫全集則鮮見刊行,因此文人士子大多通過批注本、集注本以研讀杜詩,這或許是當時比較常見的杜詩接受形態,也反映出了清代中期一般文人士子閱讀杜詩的普遍情形。

如果以上的推論能夠成立,那麼就翁方綱這一典型個案來說,他研讀杜詩的書籍來源和他所經歷的知識建構的過程之間的邏輯鏈條也得以自然銜接。正是因為翁方綱在研讀杜詩之初,所能接觸到的基礎文獻都是杜詩集注本、注本、選注本、評本等書目,因此,在翁方綱得以確立個人的杜詩批評觀念和理論

77 按:除鄭澐《杜工部集》一書外,另有一散佚書目郁長裕《鈔輯杜詩》。此書亡佚不存,據郁長裕所撰《鈔輯杜詩序》中“閒窗岑寂,手錄一通,隨筆釋其易知者”云云,可知是集亦為批點箋注之本。參見郁長裕:《鈔輯杜詩序》,《兩堂雜著·紅蕉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380,卷4,頁824。相關書目參見孫微:《清代杜詩學文獻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80—260。

系統之前，他首先經歷了一個廣泛閱讀前人評杜意見，再拈出王士禛一家論杜之語奉為準的，之後再突破漁洋論杜之蔽障，最終建構起帶有鮮明個人意識的評杜觀念的過程。換言之，翁方綱研讀杜詩的經歷和過程，尤其是觀念和思想層面的轉變和突破，也可以置於清代中期整體的學術背景以及杜集文獻傳播形態的影響與規制下加以理解和考察。

而再將視角放大到清代中期一般文人士子的杜詩閱讀和接受問題上。前文之所以要對翁方綱以及清代文人士子研讀杜詩評本、注本的選擇緣由以及乾嘉時期杜詩流傳的文本形態作進一步伸說，主要意在揭發清代文人研讀杜詩的特性以及其中可能存在但一直被掩蓋和忽略的接受局限。對於清代文人士子而言，杜詩評本、注本基本上代替白文杜詩全集成為了他們日常研讀杜詩最直接和基礎的文本渠道。也就是說，他們很大概率在一開始接觸杜詩的時候，就被動地以杜詩研究資料作為第一手的文獻。這就帶來一種潛在的風險：乾嘉學子在閱讀杜詩之初，在還沒有能夠建立起個人對杜詩的理解與認知的情況下，已經預先接受了前輩學者對杜詩的解讀和研究。因此，對於清代中期的學人而言，他們研讀杜詩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指向對“杜詩研究”的研究，或者說“杜詩學術史”研究，而非杜詩本身的研究。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這大概是清代杜詩學研究不斷走向範圍愈廣、程度愈專、水平愈深、內容愈細⁷⁸發展趨勢的內在動因；而從消極的一面來說，這一特徵也在無形之中加劇了清人必須承擔的來自前代的“影響的焦慮”，⁷⁹而如何在前人評杜注杜的基礎上，再作突破和創新，也成為了清代中後期學人研讀杜詩最主要的功課和難題。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雅博士後）

78 按：孫微曾總結清代杜詩學成就的特點，即廣、專、深、細四個方面。參見氏著：《杜詩學通史·清代編》，頁7。

79 〔美〕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黃希原注,黃鶴補注:《補注杜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6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如珊:《翁方綱詩學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
- 吳中勝:《翁方綱與乾嘉形式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吳宏一:《清代詩話考述》。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
- 郝長裕:《兩堂雜著·紅蕉山房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郎廷槐問,王士禛等答:《師友詩傳錄》,丁福保輯錄:《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 唐芸芸:《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孫微輯校:《清代杜集序跋彙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
- 孫微:《清代杜詩學文獻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孫微:《杜詩通史·清代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8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翁方綱:《復初齋集外詩》,《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翁方綱:《漁洋杜詩話》,蔣寅編:《清代詩話珍本叢刊》,第 1 輯冊 40。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
- 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翁方綱著,沈津輯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 翁方綱著,英和校訂:《翁氏家事略記》,吳洪澤等主編:《儒林年譜》,冊41。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翁方綱著,賴貴三校釋:《翁方綱〈翁批杜詩〉稿本校釋》。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 梁章鉅:《浪跡叢談》。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 陳伯海、朱易安編撰:《唐詩書目總錄(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六年(1705—1707)揚州詩局刻本。
- 張忠綱等:《杜集叙錄》。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 葉倬璋:《翁方綱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羅振常著,周子美編訂:《善本書所見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
-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 顧宸:《關疆園杜詩注解》。康熙二年刻本。

二、論文

- 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漢學研究》第28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35—165。
- 徐國能:《翁方綱杜詩學探微》,《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期(2006年8月),頁179—204。
- 莫崇毅:《翁方綱〈杜詩附記〉初探》,《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頁90—96。
- 張東艷:《翁方綱論杜詩》,《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頁75—81。
- 張東艷:《清代杜詩批評的新變——以翁方綱為中心》,《江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12期,頁116—123。
- 葉擘:《〈牡丹亭〉集句與湯顯祖的唐詩閱讀——基於文本文獻的閱讀史研究》,《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頁174—183。
- 董岑仕:《翁方綱撰〈石洲詩話〉始末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9年第3期,頁91—100。
- 劉亞文:《由蘇入杜:論翁方綱學人之詩理論體系的建構》,《文學遺產》2020年第4期,頁179—191。
- 詹杭倫:《翁方綱之“杜詩學”綜論》,《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3期,頁38—48。

Weng Fanggang's Reading and Research on Du Fu's Poetry: A Study Based on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nd Processual Reconstruction

Kong, Yanjun

(Boya Postdoctoral Fellow,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eng Fanggang's profound dedication to the study of Du Fu's poetry is widely acknowledged in the history of Du Fu studi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it is crucial to emphasize that academic research on Weng Fanggang's engagement with Du Fu's poetry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of poetics. Instead, greater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concrete practices and processes of Weng's personal study of Du Fu's poems. Here,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offer two viabl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By approaching the subject through these lenses — examining material sources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ading practices — we can trace and contextualize Weng Fanggang's engagement with Du Fu's poetry. This involves anchoring his reading experiences within specific books, texts, material channels, and real-world contexts, thereby enabl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angible understanding of how Weng'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Du Fu studies took shape. Furthermore, through such documentary investigation and processual reconstruction, we may even glimpse the broader reading practices and limitations of mid-Qing scholar-officials and literati in their study of Du Fu, shedding light on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of the era.

Keywords: Weng Fanggang, Documents related to Du Fu's Poetry, the History of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Reading, Processual Reconstruction